

石玉殿：“中国式的米丘林”

□朱佳

石玉殿,1893年9月18日出生于河南省林县东岗镇东冶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6岁丧母,7岁给地主放牛,要过饭,做过长工。饥寒交迫的生活,使他从果树栽培中找到了生计,从此,他便和树木结下了不解之缘。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就从事果树嫁接等林业工作,并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整套植树造林、果树栽培的技术。

1940年3月,林北县抗日人民政府成立后,分得土地的石玉殿,对共产党充满了感激。党号召大搞绿化,石玉殿带领全家踏遍了东冶村的山岭沟壑,采种、开荒、育苗、嫁接,还免费为乡亲们嫁接果树,毫不保留地把技术教给别人。1940年至1949年,石玉殿一家共植树3万多棵,并育成树苗25万株,全部送给群众把树苗栽到山上,还无偿给群众嫁接果树2.4万棵,石玉殿植树造林的成绩受到群众的一致称赞。1948年8月,石玉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

年12月,石玉殿参加了县委、县政府召开的林县第二届劳动英雄模范大会,荣获一等模范和“植树能手”称号。1950年1月,石玉殿出席了平原省劳模大会,荣获全省“劳动模范”“植树能手”的称号。同年9月,石玉殿到北京参加全国战斗英雄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0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米丘林式的创造》的文章,介绍了石玉殿用无性繁殖技术改造果树的新方法,称他为“中国式的米丘林”,他的果树嫁接技艺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1952年春,毛泽东委托林业部门给石玉殿寄去500棵苹果树苗,他收到后非常高兴,挑自己家最好的地栽下树苗。此后,毛泽东又寄给他40根烟台梨枝条,他亲手嫁接后也栽种在自家地里。林县的土地上奇迹般地长出了苹果树,林县历史上第一个苹果园就此诞生。

1951年春,林县县委发出“改秃山变林山”的号召,石玉殿积极响应,他选取

本村南沟一片从未长过树的荒山当突破点,在那里挖坑填土,栽植了刺槐2000棵,结果成活了1600棵,成活率达80%。石玉殿实践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群众植树造林、改造自然的信心和勇气。1952年9月,林县县委、县政府为石玉殿挂匾庆功,匾上写着四个大字“山区方向”。

1954年春,石玉殿当选为东冶村农业社社长。他带领群众苦干十载,在该村9岭、13山、16道沟的5000多亩的荒山上栽植用材林70万株、经济林25万株,实现了“松柏盖顶,用材林缠腰,果树遍沟凹”的目标。东冶村西有一条沟叫“风霜沟”,由于条件极差,沿沟的4000多亩土地屡遭风霜侵害,种不保收。在石玉殿的带领下,群众对“风霜沟”进行了绿化,根除了风霜灾害,实现了林茂粮丰,使“风霜沟”变成了“丰收沟”。1956年2月,《河南日报》发表长篇通讯《绿化山区的榜样》,向全省推广石玉殿的经验。石玉殿在全县大力宣传植树造林,

总结出成活率高的树木栽培方法,培育出耐旱、抗寒、生长快的树种在山区推广,为全国的林业发展作出了表率。他多次荣获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林业部授予的全国林业劳动模范称号,还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

通过长期的实践,石玉殿深深地体会到,林业要大发展,人才要先行。在石玉殿等人的倡议下,1958年6月,新乡专署在东冶村创建新乡专区林业学校,也就是林县林业学校的前身,石玉殿担任校长,他以极大的精力投入教学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为林县林果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62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石玉殿的园林技术》一书。他先后被聘为中国林业科学院林业科学研究所树木改造研究室研究员、中国米丘林学会会员、河南省园林学会理事、河南农学院林业系教授、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66年9月,石玉殿病重到北京治疗。住院期间,他仍不忘植树造林。他口述请人给《人民

日报》写信,《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加了编者按,号召全国各地群众按照劳模石玉殿的建议:适时选种、植树造林、绿化祖国。

1967年1月19日,石玉殿因病去世。弥留之际,他嘱咐儿子:“给组织上说说,现在国家缺木材,我死后不要做棺材,不要垒坟墓,要火葬。林县土地不多,少占一分地也能多栽几棵树。”他还对在场的社队干部说:“我活着没有完成林县荒山的绿化任务,死后要求组织上把我安葬到木皂寺,我要看着后人把它绿化。”石玉殿去世后,人们遵从他生前的遗嘱,将他的遗体火化,骨灰安放于木皂寺。他留给后人的遗物仅有两样:一把被他的双手磨得发亮的嫁接刀,半信封他亲手捡来的树种。

石玉殿辞世后不久,东冶村的群众自发在离村4里的苍柏翠林中间为他树立了一人多高的纪念碑。1984年10月24日,林县县政府决定,将石玉殿的骨灰迁至林县烈士陵园安葬。

游天洋：为工人运动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

□杨永东

游天洋,1901年出生,福建闽侯人。他自幼性情刚强,家境比较富裕,从小随兄在北京读书。1916年10月,游天洋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时称交通传习所)实习班。1918年12月毕业,他被分派到汉粤川铁路总公所工作,任汉粤铁路武昌城外鲇鱼套车站见习副站长。1919年12月,游天洋在武昌发动焚烧张敬尧“鸦片烟种”运动,焚烧了军阀张敬尧准备运往湖南的45袋“鸦片烟种”,声震湘鄂两省,有力配合了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的“驱张运动”。事后,由于军阀追捕,游天洋离职前往北京。

1920年年底,中共北方局委派游天洋到洛阳,他以陇海铁路局员司(工程师)的身份在洛阳、郑州、徐州、开封等地宣传革命理论,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发动铁路工友建立“老君会”(1921年10月改称陇海路工联合会),并以“老君会”为阵地组织铁路工友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

5月,在北京大学邓中夏、罗章龙等青年学生的宣传组织下,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宣告成立。同年9月,郑州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也相继成立。消息传到洛阳,工人们十分高兴,奔走相告。游天洋先后派人到长辛店和郑州学习经验,并于同年11月5日正式成立陇海铁路洛阳工人俱乐部。经过游天洋的主动联络,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在洛阳设立了发行站,游天洋担任发行员和特约通讯员。

1921年11月中旬,陇海铁路机务厂的法国、比利时总管无理刁难、殴打并开除据理力争的工人。事发后,游天洋迅速主持召开陇海路工联合会紧急会议,决定发动陇海铁路全线的工人举行反对裁人减薪、虐待工人的大罢工,发表《陇海铁路罢工宣言》,提出了罢免法国、比利时总管,提高工资待遇,今后不得再发生类似事件等15个要求作为

复工的条件。根据会议决定,成立了由游天洋、白眉珊、王符圣、黄文渊等人组成的罢工委员会,负责领导罢工事宜,并领导罢工斗争。同时,游天洋及时派人赶赴北京把罢工决定通报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请求派人指导;他又派人到郑州、开封、商丘、徐州、观音堂等地联络,协调全线的罢工行动。11月18日下午,李大钊闻讯后极为重视,当晚主持召开了中共北方区委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会议作出了派人以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名义前往洛阳全力帮助,并发挥其领导作用等七项决策。会议最后决定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文虎(罗章龙)前往洛阳执行任务。文虎21日晚到达洛阳后,及时会见了游天洋等人。文虎代表书记部向陇海全路工人及其家属表示慰问,赞扬工人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他表示书记部暂作陇海全路工人的后盾,正在动员各路工人全

力援助,要求全路工人团结起来,争取罢工斗争胜利。

1921年11月20日,陇海铁路在中共北方区委的指导和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举行全线大罢工。罢工坚持了七天,迫使北洋军阀政府答应了全部条件。罢工斗争的初步胜利,使游天洋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更加坚定了他献身社会革命的决心,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也更加成熟了。陇海铁路大罢工胜利后,游天洋经李大钊、罗章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发展白眉珊、王福顺入党。1921年12月,中共洛阳组成立,游天洋任组长。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河南创建的第一个党组织,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区最早发展的4个党支部、党小组之一,在河南党史和中共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党的领导下,1922年1月15日,游天洋组织全路代表在开封开会,正式成立陇海铁路总工会,并宣布加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

京分部。陇海铁路罢工胜利后,按照党的指示,游天洋辞去员司职务,专任全路总工会秘书主任,并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员的身份,以全部精力投入工人运动。

1922年5月,游天洋作为陇海铁路代表,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同年8月,他又率领由8人组成的陇海铁路工人代表团,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劳动立法大会。陇海铁路罢工的胜利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引起了中外阶级敌人的严重恐慌。他们不甘心失败,挖空心思,想出种种办法,来破坏工人运动。面对阶级敌人的疯狂破坏,游天洋忧愤难平,虽辛勤工作,积劳成疾,亦未能挽救工人运动的颓势。1922年冬,游天洋决计出巡全路,促进工人觉醒,力转运颓势。行至郑州,因突发脑充血症,医治不及,不幸病逝,年仅21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游天洋为革命烈士。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强国App”学习平台)

撬动万亿新能源终端市场

(上接第3版)

第四,民营和社会资本迎来投资契机。新政鼓励民企投资绿电直连项目,打破了过去电网主导的单一格局。大量具有技术创新和灵活机制优势的民营企业,如光伏制造龙头、储能企业等,可以在直连项目中担纲重要角色,从设备供应转向提供综合能源解决方案,分享新能源发展红利。新能源巨头也将获得新业务增长点,通过与用能大户合作共建直供电源,实现发电侧与用户侧直接对接,开拓出一个稳健的售电市场。可以预见,绿电直连模式将撬动数以百亿计的新投资,在绿色能源消费领域创造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四、潜在风险与挑战

尽管绿电直连前景可期,其在推广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风险考验,需要各方谨慎应对。

首先,供电安全与可靠性风险。直连模式下,新能源电源具有“看天吃饭”的波动特性,而专网运行存在孤岛效应,一旦电源出力不足或故障,可能导致用户供电中断。工业企业尤其是精密制造对供电连续性和电能质量要求极高。为确保可靠供电,企业往往需增配足够容量的储能设施或备用电源,这将显著增加项目投资和运营成本。江苏试点为缓解这一风险,在电池工厂直连项目中配置了200MWh储能电站和智能微电网,当风光出力不足时由储能和备用电源顶上,实现“离网不离产”。但并非所有企业都有实力负担如此高昂的备援体系,供电安全仍是绿电直连模式不可忽视的挑战。

其次,经济性和成本分摊风险。许多企业期望直连绿电能降低电价,但实际效果取决于多重因素。直供电源虽然节省了一定远距离输电损耗,但项目仍需按规定缴纳输配电费和基金附加,地方政府也不得违规补贴过网费。同时,用户需自行承担专线建设、运维费用,以及储能备用等额外投入。中能智库分析认为,绿电直连未必等于电费下降,在没有政府额外补贴的前提下,有些项目反而可能因设备投入和绿电溢价而使综合用电成本上升。因此,企业应理性评估直连模式的性价比,不应片面将其与降电费划等号。

第三,并网协调和监管挑战。绿电直连项目虽物理上部分独立于电网,但在并网型模式下仍与公共电网发生功率交换。如何确定项目与电网之间的备用容量、责任

边界,以及万一项目退出时的处置机制,都需要监管部门和电网企业细化预案。若项目运行与设计偏差过大、电量消纳不及预期,可能影响公共电网调度平衡,甚至造成局部资源浪费。

此外,大用户直购绿电增多后,传统电网售电量和交叉补贴的来源可能减少,需防范因此对电网经营和一般工商业用户电价带来的连锁影响。这要求政策执行过程中,配套完善退出机制和补偿机制,确保出现问题时有序过渡,不冲击电力市场和电网稳定。

最后,国际认证与规则衔接风险。绿电直连初衷之一是为产品赋予可信的低碳电力属性,但海外监管能否认可这种模式下的减碳效应还有待观察。例如,欧盟目前对中国电力碳排放因子、绿证互认尚存疑虑。我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争

取将直连绿电纳入认可的绿色电力范畴。只有国内模式与国际规则接轨,绿电直连的战略价值才能充分发挥。

展望未来,随着现货市场完善、储能成本下降以及更多成功示范出现,绿电直连模式有望加速推广并从特定行业走向更广泛的应用。对于用能企业而言,这是提前布局绿色用电、增强抗碳壁垒能力的机遇;对于新能源企业和投资者而言,则是拓展增量市场、创新商业模式的蓝海。但机遇伴随挑战,只有通过完善配套政策、强化技术支撑和风险管控,才能让这一新生事物走得稳健而长远。在“双碳”征程中,绿电直连有望成为连接清洁能源和高质量发展的一座桥梁,为中国乃至全球能源转型贡献新的智慧和方案。

(来源:中能智库微信公众号)

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

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